

专 题 篇

扩大有效需求与培育新增长点相结合 拉动国民经济适度快速增长

刘 鹤

从中长期的角度来看，政府实施宏观调控的主要目的就是在币值稳定的前提下保持经济持续快速成长。它意味着宏观经济的基本面正常，经济结构合理，增长速度也比较高，这显然是一种理想状态。但实际经济的运行情况往往不是这样，有时高经济增长干扰着稳定，有时稳定又制约着正常增长。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目前又处于改革的攻坚阶段和发展的关键时期，处于跨世纪之交，在这个阶段，经济增长具有最优先的地位。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使中国经济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资源供给约束走向市场需求约束，因此现阶段增长的前提条件是总需求必须充足。全面而客观地分析当前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对应状况与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措施，是我们做好 2000 年经济工作的基础。

一、反通货紧缩是当前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

1997 年下半年各类物价指数先后出现负增长的实际情况明白无误地表明，中国经济正经受通缩的威胁。通货紧缩中价格总水平不断下跌，它创造着失业，损失着有效生产能力，导致国民财富的流失。习惯于生活在通货膨胀条件下的经济学家往往低估通缩，无论西方经典的经济学教科书还是中国通用的经济学教材，都没有将通缩作为主要的分析内容，可见通缩的危害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但事实上通缩的危害性可能要远高过通胀。正如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所述：“通胀和通缩一样可怕，后者甚至危害更大”。

与通胀一样，通缩也是一种货币现象，是太多的商品在太少的货币流中运动，结果是，尽管商品价格已经一降再降，仍然不能刺激居民的消费需求，厂商因价格水平的普遍持续下降而出现大面积亏损与事实上破产，经济增长的动力与厂商的投资需求全面衰减。中国经济正面临这种潜在危险，货币供应量及由此形成的有支付能力的总需求明显不足，因此，造成生产能力相对过剩。有人常用 GDP 和价格增长与 M2 的增长速度说明目前货币供应量的适度，这种看法是值得推敲的，因为它忽视了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1995 年，我国 M1 流通速度为每年 2.44 次，以后年份不断减缓，1998 年下跌为 2.04 次，预计 1999 年跌至 1.88 次。用目前货币供应量增长速度说明问题的另一个缺陷是，它忽略了通缩的背景，通胀期的货币政策目标是经济增长率加计划价格增长率；而通缩期货币供给的目标则应是经济增长率加物价上升率再加上一个矫正区间，之所以提出一个矫正区间的主张，就在于缓和价

格下跌引起的货币流动性下降。也就是说，在通缩期，需要树立矫往过正的思想方法，以抵消货币流动性减弱→通货收缩→货币流动性进一步减弱→通缩加剧的恶性循环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1999 年社会总需求（现价）预计增长 5.5%，已经大大低于当前 GDP 的自然增长率水平。因此，目前经济总量中的核心问题就是尽最大可能拉动总需求，力求使其增长率达到或接近 GDP 的潜在增长率。但对这一点，各界看法不一，有两种有代表性的看法：一种看法是，即便总需求不足，对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发展也影响不大，在需求紧缩中恰可以加快结构调整，淘汰过剩能力，促进技术进步。静态地看，总需求不足导致经济衰退，在这个过程中，固然可能淘汰一部分劣质生产能力，但更重要的是，由于有效需求不足，相当一部分在物理上适销的产品也失去了市场，从而造成生产能力的巨大浪费和国民财富的损失。初步估计，目前钢材、水泥制造业生产能力的 95%，设备制造业生产能力的 75% 及家电业生产能力的 80% 在正常的需求约束下都是有效的，但目前其生产能力利用率分别仅为 85%、40% 和 40~50%，如果折合产值，通缩情况下每年损失的社会财富达数千亿元。另一个严重的后果是失业，这一点是不言自明的。动态地看，通缩同样存在负乘数和减速机制。总需求结构中任何一项的减少，都创造着某种不景气的预期，它使收入进一步减少，支出持续下降，市场容量缩小，信用和金融萎缩，价格下跌，因此形成不良的循环。以日本为例，经济一陷十年，失去了很多机会。另一种看法是，目前经济的核心问题是总需求不足，结构合理了，产品对路了，自然会有需求。这实际是萨伊定律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另一种表达方式。结构不合理和调整结构是任何经济的永恒主题。技术变化、需求偏好变化及体制的变化必然不断派生结构调整的要求，即使在后工业化经济体美国、日本及欧盟也都存在结构调整问题。我们必须始终抓住这个重要问题，不能放松。同时，对结构调整问题要动态地分析而不能使之静态化，任何结构合理的经济都只能是一种相对的短暂的平衡，而结构不合理则是长期的绝对的趋势。如果把短期问题与长期问题混为一谈，也就失去了讨论的基础。即使结构调好了也不等于不存在总需求不足的问题，如果仅通过结构调整就可以实现总供求均衡，那宏观政策就不必存在了。（结构调整的确十分重要，这个问题我在第三部分会专门论述，但对扩大总需求也不能低估。）在现有的及不断缩小的市场空间中，供给体系确实过剩，不然不会出现价格下跌。但目前有 70% 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如把这个比例下降 10 个百分点，形成城市规模，需要多少水泥、钢材和能源呢？目前的生产能力用于建设一批新城市无疑不是过剩的，甚至略有不足。再比如，虽然家电普及率在城市几乎达到 100%，但 90% 以上的家庭要对彩电、冰箱、洗衣机更新换代，对大部分居民来说，问题不在于品种不对路，他们看中的产品就在商店，问题是普通居民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或即期购买力不足。

我们习惯于生活在通货膨胀假说的理论和政策框架之中，20 多年来，大部分经济学家都接受了“管住货币、放开价格、充分竞争”的思维逻辑，但很少有人注意到，由于技术的发展和心理预期经历的调整，我们已经步入通货紧缩型的经济阶段。在这个时代，信息技术替代传统技术，知识和资本排除传统产品和工人，价格随技术因素内生性下降。通缩成为困扰我们日常生活的恶梦和现实，当前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中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已由通货膨胀问题转向失业问题，棘手的问题可能不只是通胀，也包括如何有效地扩大需求。

二、总需求扩张的三个渠道

金融危机后出现的总需求不足，的确有极其复杂的内生和外生因素，但具体地讲，除农产品供给相对过多引致价格下降之外，主要有三个直接原因：

第一，外资进入少了，经常项目结汇量下降，使基础货币失去了一个重要的供给渠道。金融危机发生前，外资大量进入，特别是外商直接投资大量进入国内，外币换成人民币后形成现实的货币供给；经常项目的大量顺差，通过结汇方式形成了货币供给，这两部分是基础货币增加的重要因素。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使我国出口贸易面临严峻挑战，1998与1999连续两年我国出口总值低速增长，导致经常项目结汇明显减少。随着东亚经济的逐步回稳，这些经济体对外商投资的吸引力增强，与我国形成竞争关系，使我国外商投资出现下降，导致从这个渠道供给的基础货币大量下降。（现在有些经济分析仅从外资进入中国的绝对数量来判别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忽视了其对扩张总需求的乘数作用，显然是要澄清的）；第二，商业银行的行为由盲目扩大贷款转为“惜贷”，无论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也无论其可理解程度有多高，现实的结果是，这种行为引致信贷收缩。有人说，现在不是银行“惜贷”，而是“争贷”，但无好项目，这不是实际情况，因为目前真实利率（指市场供求决定的利率如中小企业、乡镇企业与农民实际获得贷款的利率）仍然大大高于官方利率。第三，消费者支出下降。这固然与经济下滑、增长减速及对改革预期有直接关系，更为直观的原因是，社会保障金的支出欠账。长期以来，居民的住房、医疗、子女教育、养老等项目没有列入工资，由国家统收，国家代替国有部门的员工进行长期储蓄，储蓄已转化为投资，形成目前生产能力中的相当部分。当这部分能力要在市场实现时，如实现企业产权重组、在资本市场上出售股权等市场化改革时，国有职工的利益只能得到部分、局部的偿还，同时对他们而言也就意味着统支中止，而居民尚未形成自我循环的支付基础。上升到总量的高度，显然出现总需求不足。

可能还有其他引起总需求下降的原因，但对比来看，上述三点是引起总需求在同一口径下减少的最直接原因。三点都不是微观领域的局部改革所能解决的问题，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并不能自发地引起总需求扩大，调整结构也同样无法扩张总量，必须从宏观经济面临的现实问题出发，从总供求调节的宏观角度加以解决。当然，具体的入手点又是非常微观的，在中国的宏观经济体系中，微观主体不是黑箱中的等价物，而是存在明显个性差异的行为主体。

上述分析表明积极有效地扩张总需求已经成为解决当前经济总量问题的关键，宏观调控政策应围绕扩张总需求做文章。具体包括三方面内容：

1. 增加现有货币供给的渠道，研究创建新的渠道，鼓励金融创新和改善金融服务

目前的中国商业银行体系现状让人进退两难，若鼓励其扩大信贷则担心呆坏账增加，若维持现状又制约正常的经济增长。客观地看，尽管银行的改革在推进，但有三个问题制约其发挥应有的作用：一是日益强化的垄断经营，正影响这个体系的市场效率和适应性；二是缺乏来自所有者产权收益要求的压力，银行乐于买进国债，凭借债权收入顺利支付储蓄利息，而不必寻求进取或冒市场风险；三是分业管理也制约了商行的进取性，在目前通货

紧缩条件下，项目贷款的边际收益率正在下降，几十个好项目贷款的收益可能被对一个项目的错误贷款全部冲销，既然被锁定在不确定性条件下，慎审是最明智的现实选择。虽然很多研究人员强烈反对“流动性陷阱”的提法，但目前的国有商行体系恰恰陷入了这个“温和的陷阱”之中。从宏观上看，目前的局面是，央行正推进比较灵活的货币政策，通过改变准备金比例、调整贴现率、降息等各种办法增加货币供应量，但商业银行的情况，极大地抵消了央行的意图，形成“开闸放水、库满河干”的局面，这种状况必须转变，不然会使宏观政策的可操作性严重受挫。具体的政策建议是：从外部形成对商业银行利润动机的压力，国家提出明确的利润指标要求，促其调整内部治理结构；鼓励竞争，条件成熟时，适度引进来自非国有部门和外部的竞争压力；安排适应全球金融自由化时间表，研究混业经营的国际惯例，用试点的办法逐步推广。

上述政策的具体化和实施都需要时间，当前比较见效的办法是继续强化财政政策的作用，这是当前诸多选择之中唯一立竿见影的办法，中央坚定地选择这个办法是非常正确的。我们认为，目前不必顾及各种议论，要坚定不移地把这个政策推行下去，并作为一项中期宏观调控政策坚持四至五年不变。日本启动经济的教训在于犹豫不决，反复无常，直到最近，在扩大公共支出问题上才下定决心，我们要避免那种反复。目前的问题是，怎样通过实施财政政策达到扩大基础货币供给的作用，避免“挤出效应”。有两种现实的办法，一种办法是，央行回购商业银行持有的部分国债，保证基础货币供应量的正常增长，关于这一点，经济界已有建议。另一种办法是，把财政资金的项目支出转变为“种子资金”支出，组成若干机制好、专业人员经营管理、股权结构合理的基金，一方面吸收机构和个人的资金，另一方面投向边际产出率高的项目和企业，从而放大财政政策的关联作用。这种做法既可以实现由财政独撑的局面向政府与民间资金并举局面的转化，也有利于校正资本市场的扭曲，实现股市与债市的两个景气。这是财政政策的创新，具有重大战略含义。

2. 扩大利用外资

经常项目结汇的增加取决于国际市场、贸易条件、汇率及配额等多方面的约束，扩大出口的努力我们一直没有放弃，无疑要继续坚持。可以继续拓展的空间是利用外资。核心问题有两个：一是如何以透明的法律和法规取代随意性强的部门意志。比如：最近，有的部门提出了全面管住 ISP（信息接入服务）和 ICP（信息内容服务）的意见，引起种种猜测，这种现象该如何对待，显然事关重大。第二，审慎地放宽一些产业领域的进入条件，逐步落实我国政府对外的公开政策原则，这涉及到从初级产业、制造业到服务业的众多领域。1998年以来，各国投资者注意到美国经常项目逆差过大的风险，也感到其股市繁荣之下的泡沫。为防止风险，投资组合的调整已经开始，相当多的资金回流亚洲，1999年这个趋势日见明显，我们显然有必要研究和抓住这个机遇。如果利用外资的数量有一个明显提高，可以有效增加货币供给，缓解总量矛盾。

3. 配合社会保障体制的建立，提出一个“还产于民”的补偿方案，把景气预期现实化
国有部门的改革到了攻坚阶段。十五届四中全会已经提出了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现在的问题在于实施。实施的难点仍然是“人往哪去，钱从哪来”，仍然是社会保障问题。近期看，通缩意味收入的整体性下降。历史地看，统收之后的钱没有实现统支。向前展望，当前又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过渡期，如果真是形成几年景气不振的局面，后果是严峻的。我们

认为，既然存在巨大的有效潜在生产能力，就完全可以也应当把历史上的欠账变成现实的支付能力。具体办法是，建立个人社会账号，形成个人基金，还产于民，用于社会保障开支。支出方法和每月可支出数量严格界定，基金仅限于个人使用，不可继承。这项工作，无论在我们的经典理论中，还是在现代宏观理论上，都可以找到依据，也完全符合我党确定的“按劳分配”原则，困难之点在于公平合理的计算，但这并不是做不到的。实际上，只要决定这么做，居民的心理预期就会变化，消费市场的景气就会出现。另一个难点，是新人与老人之间的矛盾、国有部门与非国有部门的平衡、城乡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这显然需要慎审和认真地加以研究。这些问题本质上属于孰重孰轻的决策选择范围，如果确认增长和反通缩是战略的优先重点，至少可以进入第二层次即关于补偿标准的设立、补偿总量的测算等具体问题的讨论。

三、扩大总需求与长期增长点的结合

中国经济是个增长型的经济，也是结构转换的经济，这就决定了它不可能周而复始地运转，必须不断地进行调整和更新，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和体制。当然，所有的经济都不可能同一水平涨落，但中国要求变革的力量更大。因此，扩大总需求必须与经济的长期增长相结合，着眼于未来的趋势和机会。除了基础设施建设和教育之外，至少还有四个领域是特别需要重视的，即城市化建设、服务业发展、传统产业改造和信息产业的加强。

目前我国城市化率滞后于工业化率 20 个百分点，这是中国经济拓展市场空间的巨大潜力所在。换句话说，如果中国决定加快城市化建设，逐步把农民转入城市，可以为钢材、水泥、能源、设备制造乃至轻工产品提供一个巨大的市场平台。世界上很多经济学家都在重复一句话，当今世界还有两大市场，一是中国的城市化，二是美国的信息技术，这是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两个支点。前 20 年的教训是，我们没有提出明确的城市化方针，城市推进规划和相应的法律法规滞后，虽然长出了 20 万个小城镇，但相当部分的生命力令人怀疑，因为它们的规模太小，难以形成城市功能。“十五”规划期即将到来，非常有必要把城市发展和建设做为这一计划的主要内容。设想，如果“十五”期间建设或扩改建一批人口达到 100 万的中等城市，再发展一批人口达到 10~20 万的小城镇，会派生出多大的内需，而做到这一点并不十分困难。

服务业的发展仍然明显滞后。在工业制成品全面出现价格下跌的情况下，1999 年与 1995 年相比，服务业价格上升了 42%，年均上升 12.4%。即使在通货紧缩的 1998 年，服务业价格指数仍然上涨了 10.1%。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出现了新的“短缺”，这就是服务不足。与此同时，家庭支出用于服务业的比重正稳步扩大，由 1996 年的 28% 上升为 1998 年的 36%。然而，供给方的反应却明显迟钝，服务业比重仅从 1996 年的 30.7% 上升为 1998 年的 32.8%，若以不变价表示，服务业的比重还在下降。服务业是今后增长的潜力所在，但目前的问题是，凡是价格上扬、供不应求的服务都存在比较严重的垄断。国家一方面要适当增加对这些部门的投资，更重要的是逐步拆除进入壁垒和打破行业垄断。

中央 1999 年起开始又一次重视对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对中国经济来说，通缩为传统产业的更新提供了一次机遇。发达国家正大规模地向海外转移制造业生产能力，相当多的

发展中国家由于企业不景气而为产业发展方向困惑，我们如果抓住机遇，确实可以有所作为。最近，不少海外媒体探讨这样一个问题，中国可否成为全球制造业最大的生产基地，实际上这是完全可能的。在移动通讯设备、计算机、汽车、造船和设备制造业都存在可能，就看如何下决心。当然，我们不能盲目求大，要继续着力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要全力以赴建立高质量的公司治理结构。在这些前提下，在几个关键领域实施扩张性的产业政策是极好的机会。

网络时代的到来，迅速改变着人类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我国在硬件设计及基础研究领域明显滞后于发达国家，但硬件（计算机、通讯、网络设备等）正受摩尔定理支配，体积每 18 个月缩小一倍，价格相应下跌 50%，使得这个生产领域的边际收益日益减少。人们意识到，今后带动信息产业发展的支柱是软件和信息内容，而恰在这两个领域，我们享有巨大的潜在比较优势。以软件产业的发展为例，其发展依赖于民族的智力水平，并取决于国家的市场规模、对制造标准的控制、对开发人员的有效激励和组织。在这几方面，我们都可以大有作为，如果国家下大气力支持这个产业优先发展，形成自己的标准系列，创造良好的政策和法律环境，吸引人才，建立“种子资金”引导社会资金，就完全有可能在几年之内超过印度，成为名副其实的软件生产大国。

中国经济的前景是乐观的，如果把积极进取的短期政策与现实的长期增长点有效结合起来，我们至少可以实现 20 年以上的次高速增长，为在 21 世纪中叶全面实现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第三步战略目标奠定坚实的基础。

（作者单位：国家信息中心）

关于网络经济的几个问题

乌家培

一、网络经济的由来

网络经济在世纪之交的蓬勃发展，是与 1993 年以来国际互联网商务性应用的急剧高涨分不开的。

但就网络经济这一概念而言，它则早已有之，而且由于不同学者对“网络”和“经济”的不同理解，它有着不尽一致的内含。例如，早在 80 年代，有些日本学者鉴于第三产业中的商业、运输业、金融业等均因有相应的网络而发展起来，就把服务经济称为网络经济，提出要研究这类网络经济学问题；1992 年我率中国信息经济学代表团，访问贝尔实验室时，有两位美国学者送给我几篇研究网络经济问题的论文，其内容是讨论电子计算机局域网、广域网的成本核算、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人们也把这类研究称为网络经济学 (Economics of Networks)。

现在成为时尚而流行的网络经济或网络经济学，就其内容而言，实际上是互联网经济 (Internet Economy) 或互联网经济学 (Internet Economics)。当然，这也是一种特定的信息网络经济或信息网络经济学，它与信息经济或信息经济学有密切关系，这种关系是特殊与一般、局部与整体的关系。

人们利用网络，既可以传递信息，又可以从事各种社会和经济活动。网络经济就是通过网络进行的经济活动。这种网络经济是经济网络化的必然结果。网络化极大地加快了经济的市场化和全球化进程，它有利于发展中国家通过逐步开放和适度监管来利用世界上成熟的技术成果、有用的信息和知识资源以促进经济增长。

对网络经济可从不同的层面去认识它。从经济形态这一最高层面看，网络经济就是有别于游牧经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的信息经济或知识经济，由于所说的网络是数字网络，所以它又是数字经济。在这种经济形态中，信息网络尤其是智能化信息网络将成为极其重要的生产工具，是一种全新的生产力。

从产业发展的中观层面看，网络经济就是与电子商务紧密相连的网络产业，既包括网络贸易、网络银行、网络企业以及其他商务性网络活动，又包括网络基础设施、网络设备和产品以及各种网络服务的建设、生产和提供等经济活动。这就是目前信息产业界人士所宣扬的互联网经济，它可细分为互联网的基础层、应用层、服务层、商务层。电子商务是互联网经济的一个重要内容。据美国思科系统 (中国) 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提供的资料，美

国互联网经济 1998 年总收入为 3014 亿美元, (1995 年还只有 50 亿美元, 3 年就增加到 600 倍, 在 1998 年网络经济的 3014 亿美元收入中, 电子商务就占了 1020 亿美元。) 超过了能源 (2230 亿美元) 和邮电 (2700 亿美元) 的收入, 仅次于汽车工业的收入 (3500 亿美元), 但其按人平均的生产率 (25 万美元) 已高于汽车工业 (16 万美元), 此外还创造了就业岗位 120 多万个; 从 1995~1998 年美国互联网经济增长了 174.5%; 1998 年美国电子商务比过去所有的估计都高, 达 1000 亿美元。

从企业营销、居民消费或投资的微观层面看, 网络经济则是一个网络大市场或大型的虚拟市场, 其交易额几乎每百天增加一倍。由于网络用户普遍看好这一市场, 随着网络的扩大网络企业的股票市值不断飚升。例如, 美国的德尔公司自 1990 年上市以来其股票增值了 3 万倍。又如美国的雅虎以 400 万美元创业, 经过 4 年半时间, 其股票市值达到 400 亿美元, 增长 1 万倍, 拿其网络股收益与其财务收益相比, 超过 40 多倍。这说明网络企业与传统企业不同, 其收益更多地来源于信息资产即无形资产的价值和增值。

网络经济的上述三个层面是相互联系的。网络市场扩大了, 网络产业发展了, 表现为全新经济形态的网络经济也就必然水到渠成了。

二、网络经济的特点

作为一种新经济的网络经济, 与以往的传统经济相比, 有着受信息网络种种特点的影响而形成的诸多特点:

1. 网络经济是全天候运作的经济

由于信息网络每天 24 小时都在运转中, 基于网络的经济活动很少受时间因素的制约, 可以全天候地连续进行。

2. 网络经济是全球化经济

由于信息网络把整个世界变成了“地球村”, 使地理距离变得无关紧要, 基于网络的经济活动把空间因素的制约降低到最小限度, 使整个经济的全球化进程大大加快, 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性空前加强了。

3. 网络经济是中间层次作用减弱的“直接”经济

由于网络的发展, 经济组织结构趋向薄平化, 处于网络端点的生产者与消费者可直接联系, 因“产销见面”而使中间层次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当然, 这并不排除因网络市场交易的复杂性而需要有各种专业经纪人与信息服务中介企业的可能性。

4. 网络经济是虚拟经济

这里所说的虚拟经济不是由证券、期货、期权等虚拟资本的交易活动所形成的虚拟经济, 而是指在信息网络构筑的虚拟空间中进行的经济活动。经济的虚拟性源于网络的虚拟性。转移到网上去经营的经济都是虚拟经济, 它是与网外物理空间中的现实经济相并存的、相促进的。培育虚拟经济的成长, 促进虚拟经济的发展, 已成为现代经济新潮流的历史动向。

5. 网络经济是竞争与合作并存的经济

信息网络使企业之间的竞争与合作的范围扩大了, 也使竞争与合作之间的转化速度加

快了。世界已进入大竞争时代，在竞争中有合作，合作也是为了竞争。在竞争合作或合作竞争中，企业的活力增强了，企业的应变能力提高了，否则就会被迅速淘汰出局。企业可持续的竞争优势，主要不再依靠天赋的自然资源或可供利用的资金，而更多地仰仗于信息与知识。

6. 网络经济是速度型经济

现代信息网络可用光速传输信息。反映技术变化的“网络年”概念流行起来，而网络年只相当于正常的日历年的 1/4。网络经济以接近于实时的速度收集、处理和应用大量的信息，需按快速流动的信息来进行。经济节奏大大加快，一步落后就会步步落后。产品老化在加快，创新周期在缩短，竞争越来越成为一种时间的竞争。21 世纪头 10 年的经济将是在注重质量的基础上注重速度的经济。

7. 网络经济是创新型经济

它源于高技术和互联网，但又超越高技术和互联网。网络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以此为基础的网络经济需强调研究开发和教育培训，若非不断创新，其新经济的“新”也就难以以为继了。在技术创新的同时还需有制度创新、组织创新、管理创新、观念创新的配合。创新来自创造性。创造性的存在，要有从无序中寻求有序的环境，而创造性的发挥，则要求从有序中冲刺出来，产生适度的无序。

三、网络经济起作用的因素

传统经济是物质、能量型经济，其交易通行“物以稀为贵”的原则，商品价格对供求变化的刚性较大，甚至具有缺乏效率的僵硬凝固性，因资源匮乏使供应受阻往往成为经济的通病。网络经济是信息、知识型经济，其交易则通行应用越广价值越大的原则，商品价格最大限度地接近于严格反映供求变化的市场价格，对买卖双方具有互动协商、互利双赢的优越性，因收入与财富的悬殊加剧使需求不旺很可能影响经济发展。

网络经济与传统经济相比，不仅劳动生产率高（例如，美国 90 年代的生产率年增长速度是 60 年代的 2 倍，70 年代和 80 年代的 4 倍。），而且创造财富快（网络经济的财富创造主要不看短期利润，而着眼于信息资产或知识资产在长期的增值。据香港《大周刊》1999 年 3 月 6 日的报道，美国比尔·盖茨的财富在 1998 年每小时增加 210 万美元）近 3 年（1995—1998 年）来，美国经济增长有 35% 依赖于网络经济的发展。网络经济会促进经济的高增长、高就业、低通胀和经济周期波动的平缓。美国 90 年代经济近五、六年来的实绩提供了一个例证。网络经济的这种作用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

从网络经济的基础设施或主要工具信息网络的作用看，信息网络有强大的支撑效应、渗透效应、带动效应。特别要指出的是信息网络发展过程中有些规律对网络经济起着支配作用，这就是以下的三大规律：

1. 信息技术功能价格比的莫尔定律（Moore's Law）

按此定律，计算机硅芯片的功能每 18 个月翻一番，而价格以减半数下降。该定律的作用从 60 年代以来已持续 30 多年，预计还会持续 20 年。它揭示了信息技术产业快速增长的发动机和持续变革的根源。

2. 信息网络扩张效应的梅特卡夫法则 (Metcalfe Law)

按此法则，网络的价值等于网络节点数的平方。这说明网络效益随着网络用户的增加而呈指数增长。互联网的用户大概每半年翻一番，互联网的通信量大概每百天翻一番，这种爆炸性增长必然会带来网络效益的飞快高涨。互联网企业概念股市值连续上扬的原因就与人们的这类预期有关。

3. 信息活动中优劣势强烈反差的马太效应 (Matthews Effect) 律

在信息活动中由于人们的心理反应和行为惯性，在一定条件下，优势或者劣势一旦出现，就会不断加剧而自行强化，出现滚动的累积效果。因此，某个时期内往往会出现强者越强、弱者越弱的局面，而且由于名牌效应，还可能发生强者统赢、胜者统吃的现象。（令人担忧的是，网络经济的发展会加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南北”差距。据联合国技经贸信息网新闻的报道，至 1998 年，在国际互联网 1.3 亿用户中，发展中国家只有 1000 多万，占 7.8%，而发达国家有 1.2 亿，占 92.2%；在发展中国家每 440 人有一个国际互联网用户，而在发达国家每 6.8 人中就有一个国际互联网用户。信息社会中“信息富裕”与“信息贫困”的差异，在信息经济中将表现为“信息经济发达”与“信息经济落后”的差异。）

从网络经济的本身看，首先它使经济活动的扩展具有全球性，可达互联网连结的所有国家和地区，进入全球市场，扩大营销范围，并充分利用全世界的生产要素。其次，它使经济活动的低成本和高效率具有十分广泛的普遍性，上网的企业、家庭和其他单位，都会因交易费用降低、商机选择增多而获益。再次，它还使经济活动的主体行为有多选择性，促进生产与消费的个性化。

尽管有这么多的因素使网络经济崭露头角，给传统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但应当看到，传统经济始终是哺育网络经济的母体。迄今为止，网络经济的发展仍存在一系列制约因素，其中有技术因素，更有制度因素，这在发展中国家尤为明显。即使在发达国家，由于把网络技术用于各种目的，推动了软硬件的生产，因把万维网推广到全世界掀起了一阵热潮，结果使投资激增，新企业不断涌现，整个经济迅猛扩张，但在发展进程中同样存在一些不确定因素和一定的风险。前景诱人的网络经济，其真正的优越性在于持续的变革：以变应变。

四、网络经济对经济理论的影响

由于网络经济是信息经济的一个特称或别称，它对经济理论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两个途径实现的。一个途径是以新的视野或用新的方法来解释原有的理论，使其有新发展。例如，引入信息的不完全性、有成本性、非对称性，使经济学中传统的市场理论、均衡理论、企业理论等等发生了质的变化。另一个途径是从新的经济现象出发，研究和确立新的经济理论。例如，信息产业的发展推动经济学研究边际效益递增理论、无形资产及其评估理论等等。

网络经济对经济理论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这里选择几个重要的经济理论因受网络经济发展的影响而产生的变化，进行必要的剖析。

1. 对生产力要素理论的影响

生产力是生产关系的物质基础。生产力究竟是由哪些要素组成的，历来有不同的观点。例如，“两要素说”把生产力理解为人类作用于自然界的生产能力，它“由用来生产物质资料的生产工具，以及有一定的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来使用生产工具、实现物质资料生产的人”共同组成。“三要素说”认为生产力指的是生产总量，决定该量的生产过程的要素即生产要素也就是生产力要素。因此，它除劳动工具和劳动力之外，还包括劳动对象。劳动对象的发掘与变革对生产力的增长起着越来越大的明显作用。“多要素说”视生产力为生产率或劳动生产率，而它的高低除受上述三要素的影响外，还取决于“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中的社会结合，……自然条件”，以及其他要素。

“多要素说”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而发展。这种发展，一方面表现在决定生产力的主导因素的变化上，如从生产工具主导论到“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科技进步主导论的变化。另一方面表现为决定生产力的要素在不断增加中，除科技、管理外，又有教育、信息与知识（世界银行 1998/99 年报告《知识与发展》认为，“信息是每一个经济的生命线”，“知识是发展的关键”，“知识就是发展”。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72、130 页）等。

1991 年我曾提出，“信息是最重要的生产力软要素”，并对此观点作过全面的论述。网络经济的发展，对生产力要素理论产生了全面的影响，这表现在：使生产力的首要因素劳动力对其信息能力即获取、传递、处理和运用信息的能力的依赖空前增强，并促进新型劳动者即信息劳动者的出现与快速增加。②使生产力中起积极作用的活跃因素劳动工具网络化、智能化以及隐含在其内的信息与知识的份量急剧增大，信息网络本身也成了公用或专用的重要劳动工具。使不可缺少的生产要素劳动对象能得到更好的利用，并扩大其涵盖的范围，数据、信息、知识等都成了新的劳动对象。使生产力发展中起革命性作用的科学技术如虎添翼，由于科技情报交流的加强和科技合作研究的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信息科技成了高科技的主要代表，它对社会和经济的渗透作用和带动作用不断强化。使对生产力发展有长期的潜在的重要作用的教育发生了根本性变革，远程教育、终身教育日趋重要，本来就是与信息相互交融的教育更加信息化、社会化和全球化了。⑥使组合、协调生产力有关要素以提高它们综合效益的管理对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作用更加强化，导致管理科技甚至也成了高科技。管理信息化已发展到内联网、外联网、互联的网际网新阶段，并与各种业务流程信息化相融合。信息不仅是管理的基础，而且与知识一道也成了管理的对象。信息管理、知识管理日益成为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新型的增长点。⑦使作为生产力特殊软要素的信息与知识通过对生产力其他要素所起的重大影响和通过对这些要素的有序化组织、总体性协调发挥其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两个过程相互结合的特殊作用。

2. 对边际效益递减理论作用范围的影响

在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中，由于物质、能量资源的有限性或稀缺性、技术进步的相对稳定性、市场容量有饱和性，当需求依靠供给来满足时，任一投入产出系统中，随着投入的增加边际产出（即边际效益）呈递减趋势。这一规律性现象广泛存在，有普遍性。

到了信息经济尤其是其网络经济阶段，信息资源成了主要资源，该资源可再生和重复利用，对其生产者无竞争性而对其使用者无排他性，它的成本不随使用量的增加而成比例增加；同时信息技术发展快、变化大、生命周期短；而且需求往往是由供给创造的，产

受市场容量饱和的影响较小。因此在投入与产出的关系中出现了边际效益递增的规律性现象，这种现象还会因网络效应的作用而强化。

边际效益递减是与负反馈相联系的，而边际效益递增是与正反馈相联系的。负反馈反映原有的差异逐渐缩小以至消失的倾向，正反馈则反映初始的微小差异不断扩大导致全然不同结果的趋势。当然，这种变化都是有条件的。

认为在传统的工农业经济中只有边际效益递减的规律性而在信息经济或网络经济中只有边际效益递增的规律性的那种观点，是与现实相背的。人们会发现，在物质产品生产达到一定的经济规模之前也有边际效益递增的观象，而在信息产品生产中当技术方向有问题时也会出现边际效益递减甚至为零或负的现象。网络经济所改变的仅仅是缩小了边际效益递减规律的作用范围，使它在经济活动中不再成为起主导作用的规律。

3. 对规模经济理论相对重要性的影响

在工业经济中，由于社会分工、专业化协作的发展，由于机械化、自动化以及由此而来的生产流水线的发展，当钢铁、汽车、石化等固定成本占总成本很大比例的产业在经济中起主导作用时，规模经济即产品单位成本随着产品数量增加而降低所带来的经济性，是提高经济效益、优化资源配置的主要途径。

在信息经济或网络经济中，尽管规模经济仍然是提高经济效益、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途径，但由于生产技术和集成化、柔性化发展，数字化神经网络系统的建立与应用，由于外部市场内部化同外包业务模式的并行发展，还由于相关业务甚至不同业务的融合，当软件、多媒体、信息咨询服务、研究与开发、教育与培训、网络设备与产品等变动成本占总成本较高比例的信息产业、网络产业、知识产业在经济中起主导作用时，增加经济性效应的途径越来越多样化了。范围经济（通过产品品种或种类的增加来降低单位成本）变得更加重要了，差异经济（通过产品或服务差异性的增加来降低成本和增加利润）、成长经济（通过拓展企业内外部的成长空间来获取利润）、时效经济（通过抢先利用机遇扩大市场份额来赢得竞争优势）等各种提高经济效益的新途径出现了，这些途径不仅大企业在利用，而且更有利于大量中小企业加以利用。

无可否认，规模经济作为人类经济活动提高效益的基本途径，这个事实没有变，但它的相对重要性由于网络经济的发展确实变化了，它不再是最重要的更不是唯一的经济性效应。

4. 对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此消彼长“理论”的影响

英国经济学家 A·W·菲利普斯于 1958 年提出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或物价上涨率）之间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变动关系，低失业率与高通胀率相陪伴，而高失业率则与低通胀率同时并存，若用纵坐标表示通胀率、横坐标表示失业率，那么两者之间的这种关系就表现为从左上方方向右下方倾斜的曲线，这就是所谓菲利普斯曲线。

上述“理论”已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实践所否定。70~80 年代两次石油危机时期，出现了高失业率与高通胀率相并存的“滞胀”，推翻了失业率与通胀率反方向变动和可相互替换的“理论”。到了 90 年代，信息产业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美国出现了在经济高增长中低失业率与低通胀率并存的新经济现象，又一次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不存在什么菲利普斯曲线。据美国商务部分析，1996 年和 1997 年，美国信息技术产业的价格下降使国民经济

的价格指数下降了 1 个百分点，导致通胀率成为 30 年来最低点，同时信息技术产业还在以往 5 年内提供了 1500 万个工作岗位，使失业率降到 24 年来最低点。

有些文章为了强调知识经济对传统经济理论的冲击，把新经济实践对菲利普斯曲线的科学性与有效性的否定说成是“第一次”，这是不准确的。

5. 对经济周期波动理论的影响

正象工业与工业化熨平传统农业生产的季节性波动一样，信息业与信息化熨平了传统工业（汽车业、建筑业等）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按照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的“创新理论”，由于创新的产生不是连续的、平稳的，而是时高时低的，因此会出现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每个周期包括危机、萧条、复苏、高涨四个阶段。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大约平均间隔 8~10 年爆发一次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发达国家采取了反危机措施，使经济周期变形，危机持续时间缩短，萧条和复苏之间的界限因经济上升加快而不明显，高涨时经济发展劲头不强。于是，出现了经济衰退与经济高涨交替更迭的简化经济周期说。以美国经济为例，自 1991 年 4 月走出二战后第 9 次衰退期以来，经济高涨已持续 8 年半了。

怎样解释美国经济周期这种新变化呢？当然，这是多种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90 年代以来美国以信息技术及其产业为代表的高技术及其产业的迅猛发展，导致经济周期进一步变形。正如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所说的，“信息技术无疑巩固了企业经营的稳定性”。在美国信息技术等高技术的产业已经取代了传统的周期性产业，而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当美国 1995 年和 1996 年汽车产业和房地产业陷入萧条时，适逢信息技术产业异军突起，结果促进了经济再高涨。随着网络经济尤其是电子商务的兴起，则会更有利于延缓衰退期的到来，而使经济继续趋向高涨。但是，经济周期波动决不会因此而消失。在一定条件下，高技术及其产业也有衰退的可能。何况经济周期波动不仅仅是技术与产业的状态所决定的。在经济波动与金融波动相互影响加剧、彼此依存更加紧密的环境下，发生经济波动是很难避免的。

（作者单位：中国信息协会）

城市化的三字经要倒过来念

刘福垣

城市化滞后是我国经济社会诸种矛盾的总根源，把加速城市化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牛鼻子，就抓住了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21世纪的中国经济高速、协调、稳定、高质量的发展就有了基本保证，这不仅是发展战略的重大调整，而且是一场发展观的革命。树立了科学的发展观，从发展看运行，逐步摒弃问题经济学、符号经济学、增长经济学对我们经济决策的干扰，准确把握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时空定位，这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然而许多人接受加速城市化的发展思路，仅仅是为解决内需不足寻找出路，并没有真正从发展观、从经济规律角度深刻理解城市化的本质含义。因而在他们城市化的三字经里重城建、轻转化、无市场，把精力主要用在城市规模、城市形象、城市规划上，并为此而争论不休。作者认为城市化的三字经要倒过来念：化、市、城，要化市为城。

一、城市化的动力是效益

为什么人类社会要有一个城市化的阶段，人们走出农村向城市集聚？一个不容置疑的目的是趋利，熙熙攘攘皆为利来，皆为利往。从经济规律来看一切生产要素的聚散、重组都是为了以最小的投入，创造最大的效益。城市化就是为了节省时间，用空间换时间，追求最大的效益，这种集聚带来的不仅是时间的节约、要素的节约，更为重要的是人口的集聚，改变着人的社会关系、人的本质，引起人的自身的升华，从而产生更高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任何事情都有两方面，有利则有弊，利弊之间的平衡力还是效益，效益机制就是市场机制。只要利大于弊，就继续向城市集聚，城市规模就会继续扩大。这是人们趋利的动力在起作用；如果有一天弊大于利，城市继续扩大之势就要停滞，要素就会随着人们趋利的动机而外移。这是不用我们学者和政府操心的事。因此，城市大也好，小也好，有利有效益就好。效益也是相对的，要把城市的效益放到区域经济发展的特定阶段来考察，城市宜大则大，宜小则小，不能笼统用一个标准来判断，更不宜用行政力量来抑大崇小，或崇大抑小。大小之争可以休矣。我们应把精力用到为城市化扫清道路的实际工作上。

二、城市化的关键在一个“化”字上

城市化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由效益推动要素向一个空间相对集中。那么要素要向城市集中，从分散走向集中，从农村走向城市，要素本身必须能够适应流动集聚的变化。穷则思变，变则通，通则化，所以能变才能化。变就是改革。加速城市化的关键在于加速改革。一切要素都存在于一定的经济、社会关系之中，不改变这些关系，要素就流不起来，动不起来。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要顺应效益机制、市场机制不断变革。阻碍要素流通的过时的经济政策、体制不进行变革，城市化就不能顺利进行，滞后扭曲就在所难免。

我们首先必须明确城市化所要化的对象，把什么化为城市，大城市是由什么组成的。城市化的对象是人们的生产方式、交换方式、生活方式，是农业、农民、农村的生产方式、交换方式、生活方式。“三农”、“三方”是化的主要对象。

目前，我国人口城市化率只有 30% 左右，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10 多个百分点，更低于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决定的农产品剩余率。农产品自给性最强的粮食，其剩余率也已达 80% 左右，而其商品率目前只有 35% 左右。农村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尖锐，而相当于农村劳动力 30% 左右的剩余劳动力及其瞻养的人口还不能转移到城市中去。这是目前中国农村人口收入和消费水平低于城市人口 1/3 左右的根本原因。实践已经证明中国农民收入水平低，主要不是农产品价格低，而是他们占有占用的生产资料少，就业不充分，是他们的生存环境、生产、生活方式落后。因而要富裕农民，必须减少农民、分化农民，改革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这必须使我们目前的 2.6 亿经营规模半公顷左右的小农户不断分化，使农民和他直接占用的主要生产资料土地相分离，使土地集聚到可以企业化经营，使劳动力转化为商品，从而可以使昔日之农民义无反顾地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这是化农为工为商的过程。

农村人多地少，就业不充分，农民收入少，消费水平低，这仅仅是农民分化、劳动力要素转移的压力、动力，还必须有城市的拉力和吸力，并且这种拉力和吸力要大于一些非市场因素的负作用。城市的生存环境，收入消费水平，对一些农民具有巨大的拉动力量，但如果没有就业岗位，农民去干什么？所以城市化表现为农业生产方式的变化，农民分化的过程，而实际更需要城市本身的结构有吸收外来要素的功能。因而城市化之化，不仅是化“三农”，而且是要化分散的工商业，使要素集聚为足以不断自身扩张，不断吸收外来要素：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这里面，工业因追逐效益而集聚到某一空间，为商业的集聚兴旺提供足够的服务对象。工商业存在方式的变化，工商业的发展才是城市扩张的动力。20 多年来，农村工商业获得了空前的发展，然而由于离土不离乡、就地搞工商、城市大门关得较严，这些工商业是极为分散的。甚至一度是村村点火，处处冒烟，致使离农不离村，亦工亦农，亦商亦农，兼业现象十分普遍，农民为此增加了收入，但同时加大了农业的机会成本，使劳动力的转移对农村原始积累，对农业生产方式改造，对人口城市化而言相当程度是无效转移。这充分说明城市化之化，更重要的是转化我们的发展观。遵循正常的发展规律，而不要因为人口多的特色，而重犯白马非马的错误。白马区别于红马、黑马，但它毕竟是马，是马就要有马的生长发育的规律。人多人少改变不了城市化的规律，只能影响城市化的速度